



知的西方关于交友的格言与故事翻译出来，经白鹿书院山长章潢修改润饰，以《交友论》为书名结集出版。这是马泰奥·里奇的第一本中文著作，遂署了一个中文名字，利玛窦。

利玛窦希望大明的统治者能够接纳自己的教义，历经重重波折，终于凭借两架自鸣钟成功“翻身”——作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之一，自鸣钟博得了万历的欢心，至于其余的万国图志、西琴之类，朱翊钧用诚实的反应证明了：朕不怎么感兴趣。

1610年，“漂洋过海访大明”的意大利人在北京去世。他带来的关于西方的信息，没有在古老的东方帝国引起任何强烈的共振。

今天，当游客们走进故宫博物院的钟表馆，将为里面中外制造的、各式精美的钟表而惊艳。这些钟表除有打时打刻的计时功能外，还利用机械联动原理，使装饰的人物、鸟兽、花卉等玩艺系统不断变化，呈现各种动作，可爱悦人。利玛窦走了，而珍贵的钟表留在人间，继续忠实地记录光阴的流转。

权柄

约定俗成的看法认为，武备、军事上的废弛，昭示着王朝败落的种子已经埋下；思想上起初对西方信息的漫不经心，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先锋舵手地位的缺席。

老大帝国危机四伏，皇帝岂能坐视不见？他们究竟在乎什么？答案倒也显而易见：一切矛盾，总是统统让位于一个关键词的——权力。

权力，只有权力，才是一个皇帝绝对不舍得放手的。

而言及大明的权力、大明特色的政治体制，必绕不开宦官一节。

有明一代，宦官体系的规模逐年上升。等级上，由高至低排序，依次是太监（通常担任各个衙门的长官或者是镇守太监）、少监、监丞、乌木牌（乌木牌和手巾、小火者都承担着皇宫内的苦力活）。职能划分上，对内者负责皇宫维持和运作，对外者监视各地，担任各地方守备甚或皇帝特使。设在皇宫的机关，是包括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在内的二十四衙门。其中，司礼监是内外宦官系统的核心，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。

身为皇帝的亲信，参政的宦官倘若“不走正道”，便天然拥有结党、构陷、剥削、贪腐的能量。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，许多宦官长期随侍在侧，与皇帝的私人感情相对深厚；但他们毕竟只是“家奴”，皇帝宽容地赐予权力并默许其

种种出格行为，无非利用他们钳制现有体制下的高级官员及满足自己规则之外的“想法”罢了。一旦风向有变，宦官被抛弃，背上天大的锅，亦为皇权司空见惯的操作。

帝王的猜忌与控制欲没有尽头，明朝内廷的特务侦察机构——“厂卫”，由是诞生。厂，指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（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）；卫，指锦衣卫。因为是压制文官势力的出鞘利器，数百年间，“厂卫”的风评向来极差，遭到数不胜数的口诛笔伐。

看啊，这就是从前的紫禁城。它的正极，烜赫、繁盛、光华夺目；它的负极，却滋衍了一个可怖的权力的修罗场。大明的皇帝们殚精竭虑，指望王朝千秋万代，奈何天不遂人愿，昏昧的时局、沉重的赋役、残酷的党争、起义的队伍、人性的自私、气象的灾害、鼠疫的作乱……终汇成一曲“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，秦淮水榭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！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！”的沉痛悲歌。

紫禁城易主的结局，到底难以避免。威权的逼迫，则陷入新的轮回。

崇祯十七年（清顺治元年，1644年），李自成军攻陷北京，但很快又被清军在山海关击败。向陕西撤退前，李闯王霸气邪气发作，放火将紫禁城付之一炬，仅武英殿、建极殿、英华殿、南薰殿、四周角楼和皇极门有幸逃过劫难。五月初二，清军入京，紫禁城为其接管。同年十月，顺治在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，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。此后，历时14年，中路建筑基本被修复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紫禁城其余被毁建筑，部分开始重建。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基本完工。

剃发留辫、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……入关之时，清军即以强大征服者的姿态，张扬了其暴力统治的基础；宣告执掌帝国的权柄后，更变本加厉，且进一步“驯服”了国内的文化精英。康、雍、乾三代，朝廷发起的文化活动，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王阳明心学传统；另一部分，则是严防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。清朝皇室用修明史的名义，抓住对明清递嬗之际的历史解释权，取缔民间修撰的明史稿，发动大规模的文字狱，吓阻汉人再作同样的尝试。政府还主动编撰大型的丛书，例如《四库全书》，选择性地排斥不利于“夷狄”的记载——这些大型的编撰工作，动员了大量学术精英参与，儒生们因此被“围困”、被笼络。

文化的闭关，恰于清代所谓“盛世”之际开始；到了清末，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，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，实已湮没不彰。不仅文化闭关，这个“盛世”，文化活力整体消沉，“万马齐喑”的死寂的暮气，吞噬了最后一丝挣扎的可能性。